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〇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七七期 ——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12a）

【文革一幕】	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谢承年
【事实真相】	刘少奇的骨灰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刘立强
【亡灵祭坛】	纪念我的父亲吴天石诞辰一百周年	吴允弘
【思考探索】	试论文革中“全面内战”的成因	胡 平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文革一幕】

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 谢承年 •

湖南零陵地区（1995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7～9月间，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委根据党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地县区乡成立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简称“处遗小组”），书记亲自抓，由一名副书记任组长，下设安置组、组织处理组、政法组、信访组、综合组，共抽调1380多名工作人员，从1984年开始，历时两年半时间，对全区“文革”杀人事件进行了逐个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对遗留问题作了严肃处理（简称“处遗”工作）。我作为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文字综合的执笔人，想把时隔20多年且如今档案中难以寻找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可惜我当时保存的一大捆资料，包括一些珍贵资料，被人当做废纸卖掉了，这里凭自己的记忆，对当时的情况作个简要的记叙。

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惨剧

调查表明，零陵地区杀人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五：

一是错误估计形势，轻信谣传。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总认为阶级敌人“火烧冬茅心不死”，随时随刻梦想复辟变天，伺机反攻倒算，人为制造恐怖气氛。1967年8月上中旬，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当时当地最高领导机构）先后两次召开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会议，主要领导把会上反映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作了引证，如“‘四类分子’要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要把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土要回去”等等，强调狠抓阶级斗争，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要狠狠打击。各区社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时，不同程度扩大敌情，渲染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有两个公社以“阶级敌人报复杀人”（不实）为由，杀害4人。此后，全县到处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全杀光，中农杀一半，地富当骨干”，加之在这段时间，有四个区搞出7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更加紧张。8月17日，清塘区造反派头头主持召开千人大会，动员部署杀人，说：“阶级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会后，开始成批杀人。在清塘区的影响下，杀人风迅速蔓延开来。调查证实，前面所谓“‘四类分子’先杀党，后杀干”之类的话，只是传闻，并无证据。

二是法制遭到严重践踏。当时党政机关瘫痪，无政府主义泛滥，极“左”思潮盛行，无宪法和法律可言。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连国家主席也不能自保，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当有些干部和群众提出“杀人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依法办事”时，有的领导干部回答：“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道县柑子园公社公然挂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因有人指出“最高”二字有夺中央机关的权之嫌，后来才把“最高”改为“高级”。工作组同志询问一个当时杀人凶手为什么杀人，这个凶手竟然说：“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弟就是在“文革”杀人时被杀的。江华同志1982年回家乡零陵地区视察工作时，针对“文革”杀人事件说：“这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三是把杀害“四类分子”看做是革命行动。从杀人动机和出发点看，全区杀人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杀“四类分子”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阶级敌人复辟，保卫毛主席打下的红色江山——这是当时最时髦最响亮最革命的口号。宁远县有个农村女青年，把自己的娼娘（地主分子）抓来杀掉。有人问她：你是你娼娘一手抚养长大的，你怎么杀得下手？她回答：我要革命！据该县“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说，这个女青年凶狠残忍的表现远近闻名，年纪三十好几还没有嫁出去。零陵县马路街公社有个大队治保主任，他参与组织策划杀人，主张斩草除根，把“四类分子”和子女统统杀掉，说：“把‘地富反坏’全部杀掉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四是派性斗争引发所致。当时，“道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与“道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革联”）这两大派组织斗争激烈。“革联”抢了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据守二中，用武力控制县城。“红联”称“革联”抢枪是“反革命政变”，并从县委机关大院退居到农村。随后两派发生冲突，“革联”开枪打死“红联”两人。“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进而宣扬“武装部枪支被抢了，公检法不管事了，阶级敌人活动猖狂，贫下中农要吃亏了”，“要采取措施，先把敌人管制起来，对个别坏的要发动群众斗争处理几个”，由此引发杀人事件。

五是领导未予制止或制止不力。在杀人事件中，有怀疑的，有犹豫的，有抵制的，也有顶着“阶级敌人的保护伞，‘四类分子’的孝子贤孙”的骂名挺身而出保护的。道县有个村支部书记，把本村50多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锁在村祠堂里，安排人员站岗送水，把他们保护起来没有遭到杀害，这些人非常感动，称呼村支书为“再生父母”。但是从调查情况看，这种现象不多见，总体上是领导干部未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全区杀人面之广、被杀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就是明证。道县在驻湘支左部队47军明令禁止杀人前，主要领导没有讲过制止杀人的话，没有采取制止杀人的措施。当一些干部汇报杀人情况，请求他们采取措施制止时，他们是这样说的：“道县的问题就出在枪杆子上，杀几个‘四类分子’是小事，军分区领导和47军代表来了，把枪收缴了，武斗制止了，一切都好办了”。“现在机关干部都走了，枪也被抢了，公检法也散了，我有什么办法，哪里管得了那么多？”这个县有个大队的民兵把本村24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关押起来，杀与不杀犹豫不决，民兵营长请示公社主要领导，回答是“分子与子女要区别对待”，结果把“分子”杀了。

江华县“抓促小组”组长、县武装部政委主持召开县“抓促小组”成员会议，针对本县出现的杀人事件，讨论制定了“五条意见”，内容有：对解放17年来一直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而不能压制、指责和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主持会议的领导将会议通过的“五点意见”，以《特急电报》向零陵军分区党委汇报，请求指示，但后来未见答复。

8月21日，零陵军分区某副司令员与6952部队某连长到道县调查杀人问题时，他先后三次讲话，没有明确提出制止杀人。他们返回军分区后，将调查情况用《社情电报》报告了47军。8月26日，47军以电报（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形式转发零陵军分区关于道县杀人问题的《社情电报》时指出：“我们认为，对‘四类分子’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惩办外，‘四类分子’不能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与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能争取‘四类分子’子女。”47军的《电报》在各县传达以后，不少地方把《电报》精神理解为“对调皮捣乱的‘四类分子’可以杀”。从各县杀人情况看，杀人时间集中在当年9月（道县除外），也就是说，47军开始发出的电报，没有起到有效制止杀人的作用。8月29日，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采取措施制止杀人，9月中旬基本得到制止，其他县杀人事件到10月底陆续结束。零陵县零星杀人持续到第二年7月。东安县于1968年7～9月，采取刑讯逼供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22人。

二、杀人事件的善后工作

1980年12月6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来零陵视察工作，当地委书记邓有志汇报零陵地区“文革”杀人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好时，胡耀邦同志说：“1967年7、8、9三个月，全国不少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康生、谢富治他们搞起来的。现在已经13年了，这样的事情不要声张了，处理完了就算了，慢慢让它平息下去。对没有处理的要处理完，主要是把受害者安排好。”地委书记说的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好”，指的是按照省委1979年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问题的5号文件精神，做了大量工作。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不断深入人心，被害人遗属上访越来越多，要求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地委认为，“文革”杀人问题涉及面广，牵涉人多，情况复杂，而且岁月已久，根据党中央关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总目标，必须做到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按照地委的指导思想和“处遗领导小组”以及道县有关领导的要求，我执笔起草了《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意见》，经省委批复，形成省委〔1985〕12号文件。湖南其他地市“文革”期间不同程度发生杀人问题，省委批转这个《意见》，要求各地市贯彻执

行。根据省委12号文件精神，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安置遗属。首先，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发给遗属“平反通知书”，从政治上为“文革”中被错杀人员平反。其次，经济上给予补偿。以县为单位，统一标准，发给遗属抚恤金；被查封的财物，坚持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根据中央办公厅〔1984〕24号文件精神，按财物当时价的四分之一给予补偿；对被迫外逃人员，以乡政府名义写信，欢迎他们回来，发给安家费，按规定划给责任田、责任山、自留地，无房住的补给建房费，所劳动工分未参加分配的按当时分配额补偿；因杀人遗留的孤老孤残人员，由民政部门每月定期发给生活费；生活特别困难的，发给困难补助费。道县四马桥乡有个遗属，“文革”杀人时被鸟枪打伤，身上中了八颗铁砂弹，一直留在体内，平常隐隐作痛，工作组发给他1000元去医院做手术，使他解除了长达18年的痛苦。通过平反和安置工作，使遗属精神上得到抚慰，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第二，处理责任人。据调查，全区参与策划、部署、指挥杀人者及凶手近两万人，按《刑法》有关规定，属故意杀人，应判重刑。对于这一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如果处理过多过严，势必产生不安全因素；如果处理太少太轻，一方面遗属反映强烈，另一方面与当时全党整党关于对在“文革”中动手打人的党员给予必要的处分的规定，发生矛盾，也就是说，打了人，给处分，杀了人，可以不给处分，这同样会产生不安定因素。为此，经过认真研究，在对杀人责任人处理问题上，制定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和“组织策划指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受‘左’的影响者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的原则。具体是：为首在公社以上范围内组织策划部署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的；挟私报复，谋财害命，以夺人妻女为目的杀人或强奸轮奸杀人的；奉命为首组织策划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上级明确提出制止杀人后，仍然为首组织成批杀人的，追究刑事责任。凡追究刑事责任的共产党员，一律开除党籍。为首部署策划杀人和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奉命组织策划杀人，情节后果十分严重的；积极参与策划、批准和亲自动手杀人的，奉命杀人或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一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对奉命组织策划杀人不是为首，奉命充当凶手，能认罪认错、取得群众谅解的，不开除党籍，表现好的免于处分，对其中不认罪认错、表现不好的，给予党纪处分，包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杀人后入党的，清除出党，但对当时未成年、属从犯、共同杀人不是主犯的，被迫杀人情节较轻，能认罪认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表现好，取得群众谅解的，保留党籍，给予其他党纪处分；杀人后转干和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取消干籍，撤销职务；凡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不得进入领导班子和安排在要害部门工作。

按照上述原则和规定，全区共追究刑事责任201人，其中判无期徒刑12人，判20年徒刑21人（1968年至1979年对挟私报复、杀人后强奸轮奸其妻女的判处死刑13人，不在此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600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160多人，整党中不予登记340多人，撤销职务420多人。从处理的情况看，至今没有发现错案，证明这次处理符合省委12号文件的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这里顺便提及的是，零陵地区“文革”杀人期间，地、县两级首先是地方部队后来是支左部队主持工作的，应该说他们对杀人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当事人已调离零陵地区，我们把有关材料抄报所在部队处理，记得1985年底广州军区整党办公室两位军人来零陵，在军分区有关同志陪同下，听取了我们的情况介绍和意见，以后怎么处理，不得而知。

第三，愈合伤痕。在“处遗”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个非常重要但难度很大的工作——愈合

伤痕。当时，一些群众和责任人对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做法不理解，想不通，说“杀几个‘四类分子’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这么做是‘长阶级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个别的甚至说悔不该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斩尽杀绝。而一些遗属要求开追悼会，给死者披麻戴孝，重新垒坟立碑，提出多抓重判，甚至杀人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认为，能否消除积怨，愈合伤痕，事关“处遗”工作的成败。为此，我们花大气力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学法。一方面举办责任人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使他们懂得，“文革”杀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宪法和法律所不容许的，一定要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另一方面组织遗属学法，引导他们看清楚，“文革”杀人是在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能冤冤相报，把怨恨传给下一代。

二是坚持疏导方针，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责任人，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清除“左”的影响，主动认罪认错，取得遗属和群众的谅解，做遵纪守法的公民。对遗属，首先对“文革”给他们造成的不幸表示同情，引导他们把账记在“四人帮”身上，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鼓励他们向前看，顾大局，消除积怨，和衷共济搞四化。我们还召开遗属和责任人一起参加的大会，双方代表典型发言，谈认识，挖根源，表态度，进一步拉近他们的距离。

三是实行“三包”责任制，即由村组干部包人、包做思想工作，包帮助他们开辟劳动致富门路，一些重点对象由县区乡领导包干，促使遗属思想情绪稳定下来。通过这些工作，较好地达到了消除积怨、愈合伤痕、促进团结、和衷共济搞四化的目的。道县营江乡车边村遗属田志苟，“文革”中父亲被杀，“处遗”工作为他父亲平了反，被抄抄的财物得到了补偿，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理，还帮助他经营一个渔业生产技术项目，他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摆酒吃团结饭，还招待放专场电影。他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我们都是受害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今后要互相体谅，加强团结，努力把车边村建设好。”这一年，他被村民推选当上了村长。

三、艰辛的信访工作

我深深感到，零陵地区“文革”杀人就像撕裂的一道伤口，很难在短时间内愈合。尽管我们做了大量艰苦、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开展“一帮一”和“交朋友”活动，一些遗属的心依然没有平静下来，他们不断上书上访。省委12号文件传达贯彻后，一些遗属对其中“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意见很大，说“什么粗，什么宽，什么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正在这时，道县有个遗属得到一本上海杂志，里面刊登了一篇关于道县“文革”杀人的文章——《疯狂的七月》，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往伤口撒盐，他们的情绪又一次爆发出来，奔走相告，互相串联，赴省赴京上访，强烈要求严惩凶手。

1985年9月中旬，道县102个遗属到北京上访，他们先去国办信访局，然后去中办信访局，后来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接着要进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被中央警卫局劝退，第二天清晨，“美国之音”报道了此事。几天后，我们接省委办公厅通知，到中央办公厅汇报处理遗属上访问题。那天晚上，我们一行6人（地委分管副书记、分管副秘书长、地委落实政策办主任、地区检察院分管副检察长、我和道县县委分管副书记）被引进中央书记处一个小会议室，中办副主任周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作了关于做好遗属上访工作的讲话。我们按照周杰副主任的讲话精神，认真进行了研究，在当时整党工作繁忙、工农业生产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努力做稳定遗属的工作。

10月上旬，道县84个遗属到北京上访，他们聚集在胡耀邦总书记住地附近的街道上，

堵塞交通四个多小时，中办信访局和国办信访局的同志告诉我们，耀邦同志刚刚几天前搬家，连他们也不知耀邦同志的新住址。我们从遗属口中得知，道县有300多人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给遗属透露耀邦同志的住址，同情和支持遗属上访。我们随即确定几个干部，硬是像瞎子摸鱼一样寻找道县籍人做遗属的工作。我们苦口婆心把遗属规劝回县后，再次被通知进中南海上次那个会议室，基本上还是那些人，增加的是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监察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按照周杰副主任的要求，我们主要汇报了“处遗”的政策和遗属的要求及处理情况，最后周杰同志从广西“文革”武斗杀人，讲到内蒙古清查“人民革命党”杀人，介绍他们处理的经验，要求我们从大局出发，从首都的安定出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切实做好“处遗”和遗属稳定工作，为明年开始实行国家“七五计划”创造良好环境。

10月中旬，我们发现一些遗属搞串联，准备再次集体赴京上访，我们在抓紧做稳定工作的同时，向省委办公厅报告了这一动向。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极其重视，连续两次打电话给地委书记唐盛世同志，要求迅速做好工作，把遗属稳定在当地。当晚，唐盛世书记在道县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所有地委副书记和道县县区乡党委书记参加，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半钟，接着连夜回到各自岗位，做劝说工作。上午11时召开碰头会，发现好些人眼睛布满血丝，有的没有吃早餐，有个工作组的干部因长时间精神紧张和工作劳累，昏倒在路上。通过工作，遗属较好地稳定下来。

1985年10月中下旬的一天，省委书记毛致用在省委常委会议室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处理零陵地区“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当我们汇报当时道县主要领导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杀人时，毛致用同志站起来说：“一定要处分那个×××，不然遗属有意见，上访稳定不下来！”当汇报公安部《啄木鸟》杂志打算刊登道县“文革”杀人的文章，可能引起遗属思想波动时，会议确定由省长刘正负责，向公安部做好解释说明工作，请他们不要刊发这类文章（《湖南日报》一位资深记者曾向我索要资料，打算写一部约30万字的《道县“文革”杀人传奇》，也因此作罢）。当汇报全区安置遗属的任务很大，还需要必要的经费时，当即表示增拨200万元。

此后，随着进一步的工作，全区特别是道县的遗属逐步稳定下来，并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作者系湖南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

□ 《炎黄春秋》2010年11期
~~~~~

【事实真相】

刘少奇的骨灰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 刘立强 •

“文化大革命”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省的开封市含冤去世。这是建国后，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假错案。我的父亲刘建勋在他临终前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里，共写了十三个问题，其中专门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少奇同志在河南病逝前后的一些情况”。其中详细记述了父亲所了解的关于刘少奇同志被转移到河南开封直至不幸病故的有关情况。在信中此部分的末段，父亲提到当时社会上谣传，有一个所谓的“老工人”自称保护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父亲驳斥了这个谎言，并向党中央报告了自己在1975年夏亲自部署安排接收陆军第一军移交刘少奇同志的骨灰以及随后将其保存在河南省委办公厅档案处的全过程。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5月14日，刘少奇同志的骨灰迎送仪式在郑州举行。

父亲病逝多年后，我们听到传闻说，“文革”初期就被错误地打倒、“靠边站”长达十年之久的原省委书记赵××竟然也自称保护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而赵××是于1977年夏恢复组织生活、当年12月平反的，直至1979年2月，他才重新担任了省委书记处的书记。而此时距陆军第一军向河南省委移交刘少奇同志的骨灰已经过去了3年半的时间。1990年底，当他去世后，他保护了刘少奇同志骨灰之事还被写进了生平中。

1991年上半年，作为当年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纪登奎的后人，我和纪坡民同志曾经联名给党组织写信，驳斥了这第二个无稽之谈，并附上了当事人等的书面证明材料，陈述这段历史事实的真相：

#### ◇ 刘少奇在开封去世前后

1969年10月17日的晚上，时任河南省军区政委、省革委副主任的王新接到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的一个电话后，他即带着秘书等人前往开封机场接机。22点左右，这架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的安一二四型飞机送来了一位老人，他就是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少奇同志。“随刘少奇来的人，有中央文革专案组的邢某、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医生董长城及两名护士等。”等安排停当之后，“中央专案组”的人约王新和一军首长到靠大门内侧的一个房间里谈话，说是“奉中央指示疏散到这里来的。有医生、护士，自备有专用药品和必要的医疗器械。不到不得已，不麻烦地方……今后，一般情况下，不再打扰你们。省地市及军的领导不能到这里看望，我们也不再惊动你们……”。（李振华等著《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开封逝世及骨灰保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42页。）

当年，设在“中央文革”名下的有三个专案组。其中，第一专案组负责刘少奇等在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所谓“审查”；第二专案组负责彭德怀、罗瑞卿等在中央军委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所谓“审查”；第三专案组则负责王、关、戚等所谓“5·16”相关人员的审查。

父亲在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是这样向党组织报告的：“一九六九年林彪搞了‘一号命令’之后，刘少奇同志被安置到了河南，这件事是由中央专案组通过军队负责来办的……记得有一天，王新突然问我，开封有没有有暖气的房子，并告诉我刘少奇同志在那里的一军关着，中央还派了五个人，包括医生、护士。我告诉王新，开封有一套房子有暖气，是过去的一位副市长叫苟金笃的住的，现在暖气条件怎样不清楚，能不能住可以查一查。因为开封市除了工厂、招待所外，一般住房都没有暖气。以后王新怎样处理的我就不清楚了。”

在帮助父亲整理给党组织的这封信时，记得父亲曾告诉我，苟金笃是开封的民主人士，他好像是工商界代表或是金融银行界人物，具体我就记不清了。近年来，我在一些文章中看到，刘少奇同志在开封关押的地点是国民党时期“金城银行”的金库。还有一个说法是在开封市人委北侧的小院即北土街10号。究竟三者是一个地方，还是其中之一，我至今尚不得而知。

1969年11月11日夜里，刘少奇同志病危。王新接到一军首长的电话，说刘少奇病情恶化，正在抢救。12日凌晨6时45分，刘少奇同志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辞世，终年71岁。这天是他来到开封市的第27天。刘少奇同志的遗体火化和骨灰领取等后续事宜都是陆军第一军政治部保卫处处长张金贵等人办理的。

父亲得知刘少奇同志去世消息后，他采取了什么行动呢？关于这一点，他在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继续写道：“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军政委徐文礼同志找王新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已经逝世。王新拉着我一块听汇报。听完汇报之后，我马上向中央打电话作了口头报告。请示如何料理后事。当时纪登奎同志答复说，中央派人去处理。”可是等了几天，一直没有见中央来人。后来才知道，中央专案组根本没有通过河南省革委会，而是直接派人到开封市组织陆军第一军的部队同志处理了。

父亲去世近半年后，纪登奎叔叔才看到父亲这封信的复印件。他认真看罢并做了许多批注。其中在父亲信的上述段落两侧，他分别写下了两段话。他是这样写的：“刘建勋同志不了解情况，刘打电话问我，我请示总理，是总理要我答复他，中央派人处理。刘少奇的事，我未过问过，甚至不知道刘少奇同志在开封一军的事。（纪注 1983.9.4）”

在李振华等人的回忆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当时“中央专案组的人直接同北京联系”，“由一军负责刘少奇等人的生活保障和安全保卫工作”。而对于河南省的领导，除了上面提到的提供“找一处独立的院子”之外，中央专案组只要求一部“保密电话机”由省革委会解决。这些细节恰好也从另外的角度印证了纪登奎叔叔的批注。

到了 1975 年的夏季，奉中央军委的命令，驻河南开封的陆军第一军与陆军第二十军换防。换防工作开始前，一军的领导同志提出了将奉命保管多年的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留在河南的设想。

一军的领导同志这么做，肯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年组织上决定由他们负责刘少奇同志骨灰的保管，如今换防的兄弟部队不可能瞬间到位，万一在这期间，发生了泄密、散落、丢失、失控等任何情况，都将是严重的政治性事故。

那时，父亲不仅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同时还身兼武汉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一军的领导同志向父亲报告请示既符合党的组织纪律，也符合军队的组织原则的，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 ◇ 陆军第一军将骨灰移交河南省委

尽管刘少奇同志当时还蒙冤戴着“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错误地宣布为“永远开除出党”。父亲听了一军领导的意见，就当即对他们的请求表示同意。（《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随后，父亲还与一军领导讨论了骨灰交接细节。其中，一军方面确定由何俊德同志负责。这是因为何俊德同志既是军政治部主任，同时他还担任着开封市委书记。他身兼二职，与河南省委的不少领导同志和机关工作人员都相当熟悉。

为了作到万无一失和严格保密，父亲决定派时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的霍云桥同志执行这个特殊使命，并且亲自向霍本人下达了任务。为什么父亲会选择霍云桥而不是别人呢？因为霍云桥是父亲抗战时期在太行的老部下，他的爱人（我们都叫她小高阿姨）是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中第一个宣布起义的高树勋将军之女。

为了防止在郑州至开封来回路途上发生任何意外，就在霍云桥副秘书长临行前的一天下午，父亲又特意把给自己开车多年的司机沈进奎叔叔找来。父亲简短明了地交代他说：“你开车！开我的车！同霍秘书长他们去开封办件事。”

沈进奎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父亲 1966 年 9 月调到北京市委工作后，就一直由他开



车。无论是在父亲被揪斗、关押期间，还是父亲等市委领导与造反派周旋“藏猫猫”的时候，他总能够为父亲提供安全、可靠、周到的服务。约一年后，1967年8月父亲被中央调回河南，那时的河南派性组织严重对立，抢枪、武斗不断发生，形势非常严峻。父亲特意向北京市领导吴德伯伯请求，把沈要到了郑州继续为自己开车。父亲对沈的信任和感情是建立在那个急风暴雨年代生死考验基础之上的。

据沈进奎在后来写给我的信中回忆，大约是在一军军部搬家前的半个月左右，他开着父亲的另一辆汽车去的开封市。那是一辆苏制的“伏尔加”牌轿车。他记得清清楚楚，在路上汽车还出了故障，耽误了一些时间。

到了开封之后，霍云桥副秘书长等人先来到开封市委的宾馆，接着按照父亲与一军首长的事先约定，他们由军政治部主任兼开封市委书记何俊德同志陪同来到了一军的军部，那时已经是晚上八点钟左右了。部队的同志从楼上拿下来一个旅行包交给了霍副秘书长等人。这里面放的就是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以及骨灰证。骨灰盒是保存刘少奇同志忠骸的唯一载体，而骨灰证则是证明骨灰身份的唯一文档，在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交接全过程中，两者于理于情肯定都是缺一不可、务必完整的。

双方交接完毕后，沈在“无意间问了一句是谁的（骨灰）”，他记不清是霍云桥还是同去的省委警卫处处长还漏了一句嘴：“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要保密。”

第二天上午，他们一行人顺利、安全地回到了郑州。

随后，霍云桥就单独向父亲请示，“下一步怎么办？骨灰放在哪儿？”父亲要求首先一定“要保密”。同时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把刘少奇同志的骨灰“送到省委档案处安置存放”。霍云桥立即执行了父亲的命令。

沈进奎还告诉我，“时隔不久，有一天晚上，我给建勋送安眠药时，他对我说，你们那天到开封拿回的是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一军要搬家，先保管好，以后看中央怎么处理。”（《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以及沈进奎的证明材料《关于骨灰盒之事》。）

我认为，在“文革”那个年代的风口浪尖上，父亲正是凭着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更凭着一个高级干部的素质，他才能够作到冒风险、选准人、巧安排、严保密，最终圆满、妥善地处理了刘少奇同志骨灰的交接、保存难题。而在事后，他从来没有在战友和我们子女面前张扬吹嘘过，直到1982年末，他自知病重不治，必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才向党组织作了正式的报告和说明。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尽职责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中央办公厅的一位负责同志在得知刘少奇同志骨灰保存过程的来龙去脉后，曾经感慨地说道：“在那个年头，刘建勋同志能够这么做，真是不易啊！”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在看到父亲写的报告后的第三天一大早——1983年1月9日，那是个星期天。他就委派习仲勋同志前去北京医院看望了父亲，并表明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态度。

至于上面说到的我和纪坡民同志的联名信，尽管十八年中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正式回复。可就在2006年的6月，我们在河北省涉县还是遇见了一个好人，听到他说了一句真心话。他就是当年恰在河南主持省委工作、后来又曾任过中纪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的侯宗宾同志。

那次，我们正要将父母亲的部分骨灰合葬于涉县原八路军总部旧址旁的将军岭上。将军岭是国家一百个一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刘伯承、徐向前、李雪峰、陈锡联、黄镇、李达等开国元戎的骨灰均在此安放。母亲也是第一位被批准在此安放骨灰的抗战时期女干部。

年过八旬的林佳楣阿姨执意要参加父母亲的骨灰合葬仪式。她推迟了赶赴湖北参加祭奠李先念伯伯活动的行期，风尘仆仆地从北京来到了涉县。正逢侯宗宾同志此时在涉县视察工作。

就在父母亲的骨灰合葬仪式举行的前一天，23日晚上，侯宗宾同志请林佳楣阿姨共进晚餐。席间，我和纪坡民相约前去敬酒。当侯宗宾同志看见我们后，大出我们所料，他竟然主动开口，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写给我的信，我都看啦！可是，（赵××的生平）那个东西已经公开登出来了，不好办啊！……”

敬过酒后，纪坡民立即问我听懂侯宗宾刚才说的话没有。我们当然都心知肚明，完全领悟他的话中话。倒也真应该感谢这位前河南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感谢十八年来他始终都能够心里惦记着这件事，更感谢他能够当众公开、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苦衷。

今年11月是刘少奇同志含冤离世四十周年的忌日，厘清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剧中的细微枝节，还原历史的真相实情，让我们和后代都千万不要忘记沉重的过去，或许才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怀念和祭奠。

□ 《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

~~~~~

【亡灵祭坛】

纪念我的父亲吴天石诞辰一百周年

• 吴允弘 •

2010年阴历一月二十九日是父亲吴天石的诞辰一百周年。

爸爸在1966年8月5日才56岁，就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了。在40多年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们多年的调查，认定爸爸妈妈是文革中全国最早在暴力型“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这是文革进程中最为野蛮血腥并有重大标志意义的一天。文革前，爸爸吴天石是江苏省教育厅长，妈妈是南京师范学党委付书记。爸爸是因为他的“反动的教育思想必须彻底批判”，由于中央的某报刊要提前发难，而在江苏被最早“揪出来”的文革批判打击对象之一。

1966年8月3日晚九时左右，天气极其闷热，当时，妹妹作为学生的政治辅导员常住在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和学生“三同”，一个弟弟在南京无线电校住宿，上初中的两个弟弟都随他们各自的学校在农村劳动。我和另一个弟弟分别远在石家庄和北京。家中只有爸爸、妈妈和老保姆。南京师范学院学生，在一些极端分子的煽动和策划下，冲进家中，把爸爸、妈妈拉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中，召开“批斗黑帮份子大会”。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黑帮”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高帽子（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他们的头上。接着，又拉他们到大街上“游街”示众。开始时妈妈和爸爸还被架着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在发烫的马路上被横拖着走，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一里来路。妈妈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爸爸在“游街”后又拉回学校继续“斗争”。毒打时，有人问：“吴天石你是黑

帮吗？”他斩钉断铁地回答：“不，我是共产党员！”又问：“你是什么人？”答：“我是中国人！”这样铁铮铮的回答招来了更大的摧残。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得到消息后，立即叫省委组织部长辛少波去医院探视。经检查，爸爸双臂被扭成骨折，另有五处骨折，双腿被拖成瘫痪，身体外露部分的汗毛孔被墨汁和灰尘封闭了，形成了脑水肿。但由于爸爸伤势过重，一切努力都已经晚了。昏迷两天后，爸爸吴天石在8月5日含冤去世死。妈妈李敬仪和爸爸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3岁和56岁。

爸爸妈妈遇难后的几十年来，爸爸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战友、老上级，接触过的教师、学生和学校工作人员、文艺界的朋友和各方面的同志等等，用生动的往事，深入的和充沛的感情，写了很多令人感动的回忆爸爸的文章。使我们知道了爸爸许多为人民所做的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事情，使我们对爸爸有了更深的了解。

1949年渡江前，我年龄还小，很多事情记不起来，很多事也不知情。渡江后，我上小学六年级，就在学校寄宿，以后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是住校，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河北石家庄工作，只有假期才能回家。所以，在家的时间很少，和爸爸、妈妈接触的时间很短。他们在工作 and 单位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从不和孩子们谈论。他们在家中和客人谈工作，不让孩子们听。因而，情况了解不多。以下只是对我所知所见的一些片段的回忆。

—

1910年爸爸出生在长江北岸靠东海边与上海隔江相望的偏僻小城南通。我的祖父是独子，在南通天生港海关当小职员，平时住在海关，节假日才回家，业余时喜欢看些中医药及阴阳和风水方面的书，到现在还留有一部石印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我还见到过祖父用过的罗盘，后来此罗盘不知去向。祖父在爸爸11岁时得急性传染病去世，据说得的是霍乱。这样，家中除几间门面房的薄租外没有了其它经济收入，陷入了经济困境。家里没有了主事的男人，房租也难收到。祖母吴陈氏，小脚、文盲，但深明大义，有主见，全力培养孩子读书。爸爸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旧社会只有男孩才能算家中人，爸爸是家中的独子，很受重视，是全家的希望。爸爸说：他小时候很聪明但很顽皮，爱看闲书、斗蟋蟀等等，在小学校里读书不认真。祖母非常伤心，大打了爸爸一顿，说：“如果你要继续上学，就好好读书，不想读书，就去当学徒做生意。”爸爸表态要继续上学。

从此爸爸认真读书上学，古文、诗词等国文成绩特别好，记忆力也非常好，因此李俊民说爸爸有“过目不忘之才”。小学毕业以后，上了在苏中地区有名的南通师范，当时上师范不要学费，还管饭，家中经济负担也减轻了。爸爸在读师范（中学）时已小有名气。爸爸师范毕业后，考上了著名的无锡国学专修馆，这是专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高等学校，当时的馆长是清朝的进士、著名国学大师唐文治。爸爸的同学有文革前的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等。1932年在无锡国专毕业后，爸爸还专门到南京龙蟠里著名的国学图书馆“陶风楼”看了三个月稀有的馆藏书。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深入学习，中国数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与道德传统、和人文精神，对爸爸有极深刻的影响，影响了他一生的言行和他的教育思想。解放后，到南京工作，爸爸还特地去龙蟠里图书馆旧地重访过。可惜，改革开放后藏书都已搬走，现在此图书馆原址也已拆除，踪影全无。爸爸从无锡国专毕业后，经顾怡生老师介绍，在南通崇英中学找到了一个教职。但工作一个多月后，就因写了不少激烈的文章，上海进步团体给他邮寄材料等，被人密告，而被国民党县党部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开始时，有人耽心忠厚笃实的爸爸经不住敌人的折磨。但爸爸幼年时的同学、好友李淡人去狱中探望过两次，都见他镇静地坐在铺了稻草的地上，神态自如。被关八十多天后，经老师、好友、同学们尽力奔走。祖母几乎变卖了所有家当，花了大钱才营救出狱。爸爸出狱后在文章中写道：“如果说在此之前，只是从书本上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怎样屠杀青年的话，至此，算由亲身经历，真正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比欧洲中世纪

还要黑暗。”出狱后爸爸被反动政府驱逐出江苏，不准在江苏工作。他得到挚友李俊民的帮助，只能远去山东教书。爸爸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在23岁时专科学校毕业，出来的第一年只教了三、四十天的书，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逮捕了，后来家里用了很多钱，才把我保出来。你的祖母的头发为此白了很多。但是我更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为我认识到只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终生奋斗，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实现，子子孙孙才能得到幸福。”

爸爸在20岁时即已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30年代初爸爸被逐出江苏后，曾经在山东多所中学教书，爸爸在山东教书时就是很有影响的语文教师，是著名的进步教师。因宣传革命思想，曾多次被解雇。他曾在解放后被称为山东红大的济南乡村师范担任国文教员，当时的学生中有解放后担任云南省长的赵健民、农机部副部长景晓村、新中国首任缅甸大使姚仲明等，景晓村回忆爸爸在济南乡师上课时讲到东北的沦陷，声泪俱下，极具感染力。山东党史有关资料提到30年代山东学运中“对山东学生影响较大的进步教师有楚图南、胡也频、田在村、范明枢、马适安、王翔千、武新宇、吴天石、王溥泉（刘顺元）、路雨亭、田仲济、田佩之、王哲、何其芳、马霄鹏、李竹如、刘宪曾、于云亭、高文甫等，他们是指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抗战前夕，爸爸和好友、地下党员顾民元、江上清（江泽民的继父），以及于在春、江上青的弟弟江树峰等人创办了进步刊物“写作与阅读”，影响了很多进步青年，此刊物在抗战爆发后停刊。抗战开始后爸爸回到南通，在南通、如皋等地农村直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以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0年11月，还曾和梁灵光两人只带一个警卫员，去接管了南通伪县政府，建立了南通县抗日政权。改革开放初期，梁灵光任中央纺织工业部长时来南京考察，爸爸的老朋友施亚夫带我去看梁灵光，他还特地详谈了这一历史事件。但爸爸一直没有要求入党。爸爸后来在整风时说：“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不喜欢严格的纪律约束，想做党外布尔什维克。”在苏中抗战最艰苦的1943年，日寇在与上海隔江相望的苏中4分区重兵重点清乡，到处建起了封锁线和大量碉堡，还用竹篱笆分割各小区，抗日根据地中不少革命不坚定者投敌或逃跑了。这时爸爸却正式参加了共产党。介绍人是陈伟达和赵毓华，主持入党仪式的是钟民。钟民在改革开放后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伟达在改革开放后任天津市委书记。赵毓华曾是上海老资历的工人运动党员。

不久爸爸就随夏征农离开苏中4分区，赴三分区的宝应地区，去新建苏中军区苏中公学，任政文教育主任兼宣教科。其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革命家夏征农是苏中公学的教育长，大家尊称他为“夏老师”。爸爸从此开始了十年的培养革命干部的教育工作生涯，教育和培养了上万名革命干部。

二

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终身从事着教育工作的普通干部。他的职位现在人看来是“高干”。但他不把他工作看成是当“官”，而是在从事人民教育事业，以此为党的工作、为人民服务。他在江苏省负责教育工作13年（从1954年到1966年遇难为止），得到广泛的好评。他安于本职工作，从不想升官。中央教育部和华东局（统管华东六省一市）都曾准备调他去，都被他辞谢了。他常说：“以后不做教育行政工作了，就回归老本行，去当教师教书。”他当教育厅长时，就常去各地的学校听课，南京师范学院附小的斯霞老师的课就听过几次，发现了这个典型，亲自写了介绍文章。江苏南通的典型、特级教师李吉林，也是他发现的。他还亲自主持召开全省语文教学座谈会，总结经验，在省里推广，以提高语文教育的水平。他还准备到学校去兼课，但由于工作太忙，上了几次课以后，因为无法长期坚持下去，才不得不停止。

爸爸心目中的教育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不是为分数、为升学率服务的片面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普遍教育，而不只是精英教育。在普通教育内容上，他主张知识的全面学习，反对偏才或专才教育，反对过早的专攻一门或文理分科。

爸爸反对学校以升学率为好坏的指标。当时中、小学不分什么省、市、区重点，什么4星、5星、示范学校，重点班等等的等级，没有各种名目的评比，也不统计升学率。那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教育经费很紧张。对于省属学校，没有听说有什么经费上的特别照顾，我上过学的省苏州高级中学、省常熟中学和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都是江苏省的顶级中学，当时就没有什么特殊待遇。而当时爸爸对农村学校的经费则尽力争取。1961年有一次，我直接听到爸爸当面向省长惠浴宇争取农村学校的经费，惠浴宇说：“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大肥肉可以随便吃了，就可以多给你经费了。”而现在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校舍建筑，就比英国的新建的大学还要高级，接待室比高级宾馆的会议室还要漂亮。其它学校校舍也得到很大改善。仪器、教具等等也都现代化了。电化教育也极大地普及了。这些都说明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不是在1961年时所想往的“大肥肉可以随便吃”的时期了。但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只取决于这些。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教育理念、品德教育、教师水平、教育系统干部的水平和事业心等方面，是更重要的因素。这些方面差距还是很大的。有的方面可能还不如五、六十年代。

爸爸主张学生的学习要全面发展，不能偏科，德智体也要全面发展，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1957年我在南师附中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为了应付高考，最后一个学期里，有不少同学放松了副科学习，专攻考大学要用的学科、专攻难题。我回去问爸爸这样做好不好。他说：“学习还是要全面发展。”我坚持这样做了，毕业时各门功课都是5分。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五分是最高分。以后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国外和国外的学者相比较，才体会到它的好处。他多次跟我说过：“学习一定要全面发展”。对于科研工作，他也主张“由博反约”。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在研究工作的同时，重要的是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现在基本功深一分，将来即受用一分。做学问是要由博返约的，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然后专精一门，才能真正专下去。”在学习方法上他反对死读书，认为学习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1949年，他回访母校无锡国专时，演讲的题目就是“死读书不如不读书”。

作为他受批判和遇难的直接导火索的，是他和马莹伯在六十年代合写的，当时受到青年欢迎的书《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经验和学习方法》。这本书是他多年来研究和思考的总结，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归纳。该书对青年很有教育意义，很受青年的欢迎，因而在当时非常畅销。还在五十年代时，我在苏州，在夏天晚上乘凉时，多次听到他向来访的朋友介绍过他的这些想法。以后到了南京，和教育家吴贻芳同住，在夏天晚上乘凉时，也多次听到他向吴贻芳介绍过这些想法，以及准备写书的内容，吴贻芳很赞同。

前几年，有一个老师说：“这本书教育了我家三代人。”“上世纪60年代初期，笔者读初中。当时国家经济困难，百姓生活窘迫，但是全民学习的气氛很浓厚。1962年暑期过后我们即将由初二升到初三。当时自己属于半大小子，贪玩散漫，凭兴趣读书，学习方法也全靠自己琢磨，抓不住重点。暑假逛书店，一本价值一角七分钱的，统共68页的薄薄32开小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后来竟然与我相伴四十多年，传给了儿子再读，现在又准备传给快要上学的小孙子看了。这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3月初版，由吴天石与马莹伯二位合著的《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这本书给我力量和智慧，我在教师岗位一直坚守到退休，至今笔耕不辍。在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方面有多篇论文发表，并且主编了包括国家规划教材在内的若干著作。当自己孩子也到了上学年龄的时候，我郑重其事地把这个小册子送给他们，盯着孩子们通读以后谈自己的体会。几十年以后，纸张已经发黄的这本书又成了孩子们成长的催化剂，直到他们读完了博士，还在发挥作用。薄薄的小册子，被孩子们精心保护，并且加了塑封，说是准备留给他们的孩子继续学习之用。一本小书，相伴终生，惠泽三代。感谢和怀念辛勤播种光明的前人和英年早逝的教育家吴天石先生！”这本书不仅介绍古人的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介绍了去除了封建糟粕后，古人的尊师重道、刻苦学习、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

习精神。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本书却被批判为爸爸的反动教育思想的总结。

三

他在教育厅的工作重心是中、小学普通教育，特别是贫困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在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的时候，为了解决农村小学生升学和提高文化水平的现实困难，在党中央、江苏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他还特别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农业中学付出了几年的心血。没有教师，就从城市里招高考落榜的高中生，经短期培训后担任。没有经费，就在农村人民公社协助下，由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共同劳动生产，解决经费问题并结合劳动生产联系实际进行教学。在办农业中学的几年中，他和当时江苏省委分管文教的书记陈光由共同工作、志向相同，而发展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几十年后，当时的农业中学教师还说：“吴厅长为农村普通教育的发展办了实事”。

爸爸认为教师是学校的主力，没有好教师就办不好学校。他很关心普通教师，尽可能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高兴。要使教育厅成为教师之家。

有一年爸爸在苏北，到淮阴刘老庄附近农村学校视察，乘一辆小吉普车在贫困农村的高低不平的黄土小路上压死了一只小猪，因急于赶路，一些同志提出等视察完成后，回来时再找农民赔偿，爸爸不同意，他说：“一只小猪对一家农民来说就是大事，我们现在走了，他们会以为我们不赔了。”当时按爸爸的意见找农民赔偿小猪后，才继续赶路，虽然迟到了，还是完成了视察工作。在爸爸看来人民群众的事都是大事。同样，在爸爸看来普通教师们的事也都是大事。

再有一次爸爸去苏北视察工作，遇到一位50年代复旦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一所中学教俄语，这位素昧平生的知识分子找到了他，诉说他的苦衷和抱负，希望能调到一个能发挥其专业作用的地方工作。回南京后，爸爸着手为他联系，终于使他如愿以偿，调到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工作。

我的大姨夫和和大姨妈在南通市工作，他们的独子在如皋一所中学教物理。50年代初，他们希望爸爸帮助他们把独子调到南通市工作，爸爸妈妈做他们的工作说“这样的情况很多，你们也不是最困难的一家，以后再说。”过了几年以后，姨夫姨妈老了，我的表弟才按照政策调回南通市某中学工作。对此事姨妈一直有意见。

乐瑞丰是我的高中同学，爸爸并不知道这是我的同学。乐瑞丰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在苏北农村教书，他家在南京远郊的贫困农村里，有11口人，只有他父亲一人可劳动，非常困难，想“回宁，帮父撑撑快要倾倒的11口人的一个家。”他说：“1963年的一个夏天，我带着无望的心情，走访了省教育厅。说出了来访的目的和困难。当时吴厅长带着同情、关心和理解接受了我的申请。两周后，我接到了回信：文已下发，回校办手续。我们全家都惊震了。感激的泪水，唏嘘的哭声，融成一句话：吴厅长，你救了我们一大家子了。1963年底，我回宁了。我带着吴厅长的鼓励 and 希望，又走上了讲台，从事我的执教工作。我辛勤的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得到了学校与学生的认可和嘉奖。”直到我们班开毕业50周年同学会时，乐瑞丰才知道吴天石是我的父亲。乐瑞丰在回忆中写道：“阴沉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明媚的阳光终于洒向祖国大地。祖国在发展，人民在欢笑。此时，我要向吴伯伯夫妻献上一束鲜花，愿你们在九泉之下，好好地安息吧！党的好儿女，教育界的老前辈，人民的好公仆，我们永远的怀念你，你的名字永垂不朽！”

我的高中同学蔡抚民，高中毕业后，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他父亲曾任国民党军统的中将）没有被大学录取。他经过徐州师范学院的短期培训后，分配到苏北的贫困地区睢宁县农村

任农业中学教师。他工作努力、肯动脑筋，工作中成绩突出，还向我父亲写信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很受重视。我父亲曾亲自向我说过此事。因他的突出成绩，当选为江苏省农业中学优秀教师，出席了江苏省农业中学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并没有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影响他。

爸爸尊重人才，善于发现、关心、爱护和帮助优秀人才。对待民主人士更是肝胆相照、诚恳尊重。爸爸与一起工作的同事则相处很好，从不争权夺利，不勾心斗角。

钱仲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清诗专家，爸爸在无锡国专的学长，解放初因为一些历史问题不能在大学教书，爸爸深知钱先生的学术造诣，爱惜人才将他连续调换几个单位，最后调到江苏师范学院工作。改革开放后完成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和主编了1200万字的大型清代诗歌纪事文献《清诗纪事》。钱仲联先生在爸爸逝世二十周年时，特赋四绝句悼怀：

赤马灾年记逝年，十年月缺十年圆。欲将长恨为冰魄，伴汝精魂到九天。
树人树木百年心，革命还须士若林。教育一生全为党，至今桃李尽成荫。
腥风血雨石头城，学圃何堪此体横。有项不随胸骨折，浩然正气群魔惊。
同学梁溪久见知，春兰秋菊不同时，澈泉泪尽悲难尽，诉与回肠七字诗。

著名作家高晓声、宋词在极左年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打成反革命，被下放到农村，爸爸对他们还是时常记挂在心，利用各种机会和他们联系，给他们帮助，四人帮打倒后，他们都得到平反，写出了很多作品，做出了成就。

爸爸刚到省教育厅时，厅长是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国际知名人士、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委吴贻芳。副厅长有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委古M。五十年代，我家和他们两家同住在四条巷的一处小楼。爸爸是副厅长、党组书记，负责全面的工作。但他对民主人士很尊重，让他们有职有权，相互肝胆相照，相处很融洽，受到了省委统战部的表扬。在那因言可以致罪的年代，吴贻芳谈到她和爸爸的关系时说：“在天石面前我是什么话都敢说的！”不久吴贻芳调任为副省长，爸爸转任厅长，但对她仍然很尊重，有机会就向她汇报工作。有一年春节我和爸爸到她家去拜年，就听到爸爸当面向她汇报近期教育工作的情况，使她很感动。

爸爸在工作中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光长期相处，志向相同，成了知心的好友。陈光是负伤四次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为人正直，对同志热情，对党忠诚，对普及农村的教育极其热心，爸爸很尊重他。但他们是君子之交，从未谋图过私利。“陈光同志”，我家平时都这样称呼他。他在文化革命中长期饱受迫害和摧残。1976年，当他被解放回到南京不久，就请人告我到他在太平路的临时住所去见他。我见到他已经病容满面，我按习惯称他“陈光同志”，他紧紧拉住我的手，泪流满面，竟相对无语。1984年陈光由北京回南京养病，陈光在病中还满怀深情地写了回忆我爸爸的长篇文章，内容深刻、感人至深。两年前，时年89岁的陈光夫人陶云霞还对我说：“吴天石是陈光最好的朋友。”

四

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很严格。但从不打骂，不疾言厉色。对学历也不硬性规定，能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从不要求他们以后当官发财，而要求孩子们成为普通的文明、正直、有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尽力的人。

1948年四月，由于国民党黄伯韬兵团扫荡苏北，爸爸带华中公学四、五千人，由江苏盐城东海边的陈洋子一带北撤山东，国民党黄伯韬兵团则在后面追赶，直到接近陇海铁路，黄

伯韬兵团才转向徐州方向去。而我们则穿过敌人的陇海铁路封锁线，走向山东。那时我刚十岁，一路上我都跟着爸爸和大部队步行急行军，弟弟年龄小，只有六七岁，只好随行李坐运输员的独轮车。在江苏地区是平原，为了防止敌人空袭和保密，都是黑夜急行军。到了山东鲁南沂蒙山区后，都走山路，路不平、石头多，我脚痛受不了，又看到部队里已有个别比我大的孩子骑毛驴，于是多次向爸爸提出骑一段毛驴，最终找农民征用一条毛驴，骑了半天。到目的地后，爸爸和其它领导一起开行军总结会，爸爸对此事做了自我批评，指出不该迁就我的要求，征用农民毛驴加重了农民负担，下次决不这样做。我知道之后，非常后悔，以后再没有向爸爸提出过非份要求。

我们家从不集体长时间闲聊。爸爸工作很忙，晚饭后，大家最多聊20几分钟，但从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从不说人家的坏话。然后就各人做各人的事。爸爸和妈妈看文件、看书、报，或者起草文件和会议讲话、报刊社论等。爸爸还要看朋友和群众的来信，注明给他收的群众来信他都要亲自看和回复，每天都有10封左右，他认为这是联系群众、了解基层情况的好途径。这些信封上的邮票就成了孩子们集邮的最好来源。妈妈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工作，同时还兼课，每天晚上还要备课，很忙。星期天除了工作外，就是接待客人，有谈工作的、有新老朋友，经常留客人在家里吃饭。接待客人时不让孩子们在场。

他们不打牌、不旅游、不走访上级连络感情。虽然爸爸爱好文艺，创作过剧本以及很多广泛传唱的歌词，但由于业余时间工作忙、来访的人多，平时也很少看电影和文艺演出。爸爸的老战友王韦平（韦平），曾经住在我家隔壁，他们的书房窗对窗，王韦平说很少看到爸爸书房的灯在夜里12点以前熄灭。他们这种苦行僧般的工作狂、学习狂行为，不少人不理解，反而说他们是傻。这种生活和现在的一些所谓“高干生活”完全不同，现在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这是不可能有的“异类”、“神话”。

艰苦朴素是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财富，当时家中孩子多，有7个要上学，祖母、和从未出嫁的大姑妈要供养，要付保姆的工资，来客多，即使因公来客也都是自费在家招待，父母的工资有限，经济很紧张，没有存款。房子、家具都是租用公家的。家里大家很少有新衣服，没有皮鞋。家中伙食很普通，也没有零食和水果吃。家里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都没有，后来妹妹参加了工作，她用工资买了一台收音机。他们从不公车私用，不沾公家的便宜，不找关系利用特权买紧俏商品，也不走后门。他们不吃补品，只订了一小瓶牛奶给爸爸吃。来访的新老朋友和群众也从没有人来送物送钱的，连水果都没见有人送过。相反，在困难时期爸爸还把自己省下的粮票、香烟送给有困难的人。1966年8月5日爸爸含冤与世长辞，省教育厅来人帮办后事，要我妹妹找几件衣服好让爸爸衣着整齐地火化。我妹妹翻箱倒柜找不出一套较好的衣服，更找不到一双新的布鞋。出于无奈只得找了一套半新的中山装，临时买了一双鞋，让爸爸草草火化。这些都直接教育了子女，使我们能吃苦，甘于清贫，顺利渡过了在爸爸妈妈遇难后，文化大革命中那长期、艰难的日子。

渡江后，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住校。学习和住宿过的学校有：无锡师范附小、无锡师范初中部、省常熟中学、苏州市一中、省苏州高级中学、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住的都是破旧的大房间，通铺，几十人或上百人同住一间。住校时吃大锅饭，五十年代经济水平低，饭菜很差，早晚是稀饭咸菜，中饭是糙粳米饭，每周只有一次改善伙食，吃少量肉丝或小鱼。家里不给零花钱，生活很艰苦。在省苏州高级中学时，星期日想和好朋友、同班同学黄钟一起玩乒乓球，没有球拍，我们连最便宜的木板拍都买不起，木板也找不到，只好用砖头代替。苏州农村来的黄钟后来考取北京大学化学系，事业有成。我在南京师范学院附中住校时，家在大行宫四条巷，学校在察哈尔路，路很远，为节省公交车票费，星期六回家和星期天去学校时都是步行。有一次我因生病发烧回家，也是坚持步行。

1957年我高中毕业，这一年国家调整经济并大幅度减少大学招生人数，大学录取率低，政府号召落榜生下农村下基层。爸爸和我谈话，要我做好思想准备，考不取就下农村。新华日报知道了，还发了报导。我们家的孩子升学都是自己考，不走后门。当时党风和社会风气都很正，省教育厅负责人的子女也不能特殊。爸爸不让我在学校里讲家长是教育厅负责人，不搞特殊化。在苏州时，以至我的班主任都不知道我父母做什么工作。

五

1966年春节前我探亲回南京，这是文化革命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春节前，曾应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的邀请去北京中南海她家玩了四天。在北京感到和往常一样，一切都很平静。

春节期间爸爸的老朋友王治平和张慧剑来访，他们在谈话时，张慧剑说：“我看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海瑞罢官，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批判。”爸爸听后没有讲话。张慧剑是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民主人士，是王治平从小的邻居和同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对我们关怀备至的王治平伯伯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春节后，爸爸带我去上海，到上海后，先到第一医学院看望了老熟人、党委书记陈同生（陈农菲）。陈同生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对革命有很大的功劳，电影“东进序曲”中的我军谈判代表就是写的陈同生，陈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遇难身亡。爸爸又去华东局看望了夏征农夫妇。爸爸回来后，在衡山宾馆遇到在华东局工作的刘和庚，刘和庚问爸爸：“你为什么不用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爸爸说：“这种文章我写不出来。”第二天爸爸去看望了顾民元烈士的遗孀朱秀英和她的女儿顾乃粒（顾民元烈士是爸爸的好朋友，顾民元还是江上清烈士的入党介绍人。其父顾怡生先生曾是爸爸的老师，爸爸对顾怡生先生一直非常恭敬），充份体现出尊师的美德。晚上爸爸和我去看望老友李俊民和夫人汪臻子。当时李俊民正在被批判，几乎无人敢去看望他。我们在他家吃晚饭。整个晚上气氛都非常压抑，有时大家相互无言以对。当时的情况李俊民在文革后写的回忆中已详细叙述。回招待所后知道老熟人、著名作家吴强曾来看望爸爸，没有遇到。因为时间紧迫，爸爸无法去回访吴强。第二天，我们就回南京了。与表面平静的北京相比，上海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使人感到重大的政治斗争即将来临。

回南京后第二天，我就回石家庄工作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我远在河北石家庄，他们遇难的消息一个多月后才知道。

六

爸爸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相信马克思主义，为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而奋斗。他对毛泽东很敬佩，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对毛泽东的诗词也很赞赏，曾写了不少文章进行过分析。但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指示时，不唯上、不唯书。他说就是圣人仓促之间讲的话也是会有错误的。爸爸对毛泽东的一些指示是有保留的，有不同的看法的，对一些做法也有不同的意见，迫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却无法公开表达。

我在大学时，学校里大跃进后政治运动不断，大搞形式主义，就是不抓正常的业务学习，业务学习效果大受影响，使我的思想非常压抑。爸爸知道后多次对我说：“年轻人一定要开朗。”“毛主席的很多指示是战略性的，不能作战术性理解。比如毛主席说上课可以睡觉，但是大家上课时都睡觉就不对了。”“学习毛主席指示不能搞形式主义。”“小平同志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庸俗化。”“学校应该以学为主。”

南京斯霞老师的事迹发表后，反响较大。但不久北京传来信息，认为斯霞的经验有问题，

她提出的对小学生要有“母爱”、要用“童心”去了解孩子们的心理，才能教好小学生，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人性论，要批判。因此，报刊发表了批判“母爱”、“童心”的文章。有一天妈妈向爸爸介绍了南京师范学院讨论此事的情况，爸爸听后没有讲话。以后也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要批判斯霞老师和“母爱”、“童心”的话。

很多人认为爸爸是好好先生、谨小慎微。实际上，他对敌斗争不畏艰险，而对朋友、战友和同志却非常关爱。但爸爸对于多年来不断升级的，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政治斗争，个人崇拜，等等，感到困惑。在深切地思考同时，只好用谨小慎微来保护自己。也经常劝有关的人注意在政治上保护自己。

普通农村教师蔡抚民为忧国忧民，大跃进后，不断向中央反映农村真实情况，建议改变农村的政策，包产到户，因而于1963年被捕，判刑八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彻底平反。蔡抚民回忆说：“就在1960年那个年代，大跃进的饥荒恶果已经显现出来，尤以农村最为惨烈。这也是我生命历程中，心灵最为痛苦矛盾的时期。课堂上我也讲形势大好，而课余油灯下，却向苏皖两省委疾书形势大糟，但杳无音讯。我多么想让上级领导了解下情啊！于是想到了我熟悉的允弘父亲。1961年年初四去他家说有些材料托允弘转交吴厅长。第二天，我就匆匆赶回徐州准备新学期的开学。年初八，县教育局打电话给乡文教员叫我到县里一趟。初九，县级领导叫我回南京见吴厅长谈教育工作。这次见到他已是第三次了，但增添了几分严肃。坐定后就直奔主题：“你给我的材料我看过了，有这么严重吗？”我无言以对。只是农业的凋敝，农民的凄苦，自己的无助和委屈，一齐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哭了起来。这也是吴厅长始料不及的。他沉默良久，倒叫我慢慢说，并耐心认真地听了我的如泣如诉的“不同声音”，很少插问。最后吴伯伯语气缓和、真诚地开导我如何看形势，坚信党能克服暂时的困难，并爱护的嘱我立足本职把书教好就行了。谈话大约一个半小时，不想这竟是最后一次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吴厅长身为高级干部，如此关切着一个普通乡村教师的思想成长，令我终生不忘。人们对过来的事会看得格外真切。我是1963年春节后被捕的。离吴厅长的召见，相距整整两年。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只要有一个无名之辈揭发或告密，足可以扭转某个人的一生命运，而吴厅长身居高位，又和我的观点不一，只需给有关方面打个电话，就易如反掌的立刻把我打入另类。但吴伯伯始终没有这样做，其中原因已永远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吴厅长出于对后生的关爱和包容，一直把我看成是成长中的认识问题，定格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大千世界，半个世纪，多少事付诸东流，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省教育厅吴天石厅长，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大家纪念他，感激他，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李文瑞先生回忆说——

1963年深秋，吴天石到常州，凭吊李兆洛故居时，转道三河口中学访问高晓声。两人似乎没有见面，吴归来时，又对我大谈司马迁答任少卿的一段话：“……文王拘羑里，演周易，孔子乞陈蔡，著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刖足，兵法修列……”老教育家擎着一杯残酒，反反复复地诵念着。看得出，引古喻今的影射里，实指的是高晓声：在错误的时代、获错误的处分，发愤图强，将来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唉！唉！打一巴掌，再喂一块糖，做皇帝的都这样子！”老教育家愤愤不平，自言自语，也似诉向天下。

“培养一个好干部不容易，培养一个好作家，更难！”老教育家仍喃喃自语，微弯的嘴角噙着似乎不愿倾吐的焦虑和哀愁。

“在苏南文联时，吴天石和高晓声曾有过部属关系，但不密切。世态大抵扶起不扶落，锦上添花的多。高晓声在阿鼻地狱里，人们如避蛇蝎，吴天石竟毫不避嫌，屈尊造访，并且对人纵谈所感所想，这是老教育家的非凡处。但是高晓声深山藏璞，道德文章，却久已心仪老教育家的胸怀了。千里马是客观存在的，本来不需要伯乐慧眼拔泥淖，但在这个世道里，没有一声

长鸣能行吗？”

但是，爸爸对于当时日益升级的和尖锐的党内斗争和社会上的极左思潮，也就是以后称之为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可能对自己的影响，终究还是没有足够的思想认识。早在65年初，国内政治斗争的气氛已经很浓，爸爸曾经让在家养病的弟弟认真读一遍他写的《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一书，看看有什么问题。可弟弟看了后说除了一点“成名成家”思想外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但是没有想到的是，66年5月16通知后，紧接着6月就在报刊上对爸爸进行了点名批判，那本书立即升级成为了向党进攻的“大毒草”，成了爸爸的“反动教育思想”的罪证！7月，江苏省在数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点名批判了四人，其中有爸爸。爸爸受到的压力可说是极度升高。同时在南京的弟弟妹妹们也受到了各方面非常大的压力。一天妹妹与爸爸谈话，说：“爸爸，你到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不要瞒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不能寻短见。”爸爸坚毅、坦率地对妹妹说：“你放心，爸爸、妈妈历史没有问题，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爸爸有缺点，有错误正在检查。爸爸、妈妈不会对不起党，不会对不起你们。”后来，爸爸对弟弟说：“运动过后，让王治平伯伯送你到三线工厂做工好吗？”可见爸爸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爸爸看似为人谦恭，但内心极刚正。追求真理可以奋不顾身，但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而是认真地自我评判，对于强加给他的无端诬陷、栽赃却绝不会承认。“自有心肠同铁石，岂叫风雪损朱颜”这是爸爸生前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它充分体现出爸爸的这些性格。

1966年8月3日，那惨痛的一幕时时旋绕在我们兄妹的心头。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死掉了。”现在纪念爸爸真是很难全部表达出自己心中的感情。

1986年11月，爸爸遇难二十周年。在江苏省召开的“吴天石教育思想研讨会”上，中国共产党江苏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柳林说：“吴天石同志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保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坚贞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风亮节。他在被人折磨得遍体鳞伤时，还痛斥一小撮坏家伙，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片丹心、铮铮铁骨，永为后人楷模。”这也是我们家后代传家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个普通的农业中学教师说：“大千世界，半个世纪，多少事付诸东流，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省教育厅吴天石厅长，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大家纪念他，感激他，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爸爸去世43年后，2009年国庆前夕，由江苏教育报刊社主办、《江苏教育》杂志社、《江苏教育报》、江苏教育新闻网承办的全省评比活动中，爸爸被选为“新中国60年江苏教育最有影响人物”之一。这也是对爸爸一生献身教育事业的评价。

谨以此文纪念爸爸诞辰100周年。

2010年3月

□ 原载《记忆》第63期

~~~~~

【思考与探索】

试论文革中“全面内战”的成因

• 胡 平 •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准确地说，在1967年到1968年间，在中国各地，都发生了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群众或群众组织之间的大量的暴力冲突（即武斗），从动手动脚到动枪动炮，其规模之大，持续的时间之长，以及造成的民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都不亚于一场战争。毛泽东在一次和外国友人的谈话中，半开玩笑半当真地把它称作“全面内战”。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武斗。

毫无疑问，发生文革武斗的原因很多，包括毛泽东那套意识形态灌输，极权主义的权力结构，社会上不同阶层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等等。但是上面这些原因，文革前17年就存在，1969年之后也还存在于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在此前此后都没有发生武斗，唯有在1967年到1968年间才发生武斗？可见还有一条原因。依我看，那就是对群众之间的人身侵犯与暴力冲突，政府故意地、有选择性地撒手不管。

应该指出，把文革中不同派别的群众之间的暴力冲突称作内战是不正确的。因为内战的定义是，在同一个国家内，不同的组织化团体，为控制或者推翻政权，以及部分群体为了脱离原有统治、建立新国家政权而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简单说，内战意味着有政府但有一派人反政府，不承认政府的权威，用武力反对政府。例如国共内战，是共产党不承认国民政府，是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政府的军队开战。文革却不然。在文革中，各派群众都是承认并且服从同一个政府，即所谓“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譬如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还存在，但是各国之间争战不休，那是因为周天子早就没了实权，名存而实亡。类似的，在三国时期，曹操和刘备打来打去，双方都打着汉家天子的旗号，那是因为汉献帝早就沦为傀儡。文革却不然。在文革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政府不但存在，而且拥有极大的实权。在文革中，不但各派群众都是真心实意地承认和拥护这个政府；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暴力机器即以军队为代表的武装力量，也是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

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建立政府的本意就是让政府垄断暴力工具，一旦群众之间发生暴力冲突，政府就动用强力予以制止。然而在文革期间，准确地说是在1967年到1968年间，当群众之间发生暴力冲突时，政府故意撒手不管，听之任之。

不错，在整个文革期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都在不断地重申“要文斗不要武斗”；但问题是，政府只是在那里提口号，发文件发社论，却并不采取强制措施。有些地方发生了武斗，政府也派出军队去制止，但解放军到了现场却只是在那里摇动小红书，嘴里喊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并不动用强制力。这怎么能有效地制止武斗呢？

在文革武斗高潮期间，江青提倡过一个口号“文攻武卫”。对这个口号，现在还有争论。反对这个口号的人说这个口号实际上是鼓励武斗，赞成这个口号的人说自卫总是合理的正当的，否则岂不是让对方打了白打？武斗期间被引用最多的一条语录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句话看上去当然没错。但问题是，这句话只适用于无政府状态。有政府就意味着每个人放弃自己实行惩罚与反击的权利，而把这种权利交给政府。在有政府的情况下，即便别人犯了我，我也不应该犯人，我应该报警，我应该找法院打官司。文革时期的问题恰恰就是，警察、法院乃至军队都故意不管。

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讲话里明确指示，对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要“四不”：“不怕乱，不管，

不急，不压。”当然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有选择性地不管，有选择性地故意撒手；而同样是故意撒手，有时还有程度上的差异，对有的派别撒手得多些，有些派别撒手得少些；如此等等。有了这“四不”，群众之间，尤其是群众组织之间，又怎么能不打得昏天黑地，没完没了呢？于是就形成了所谓“天下大乱”——当然，是有选择性的“乱”。毛说：“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也就是说，毛通过这种办法去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我们知道，人们建立政府，就是为了防止人们彼此伤害。一旦政府故意地、有选择性地放弃这一基本职责，那就必然导致大量的暴行。这就是文革中群众之间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基本成因。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